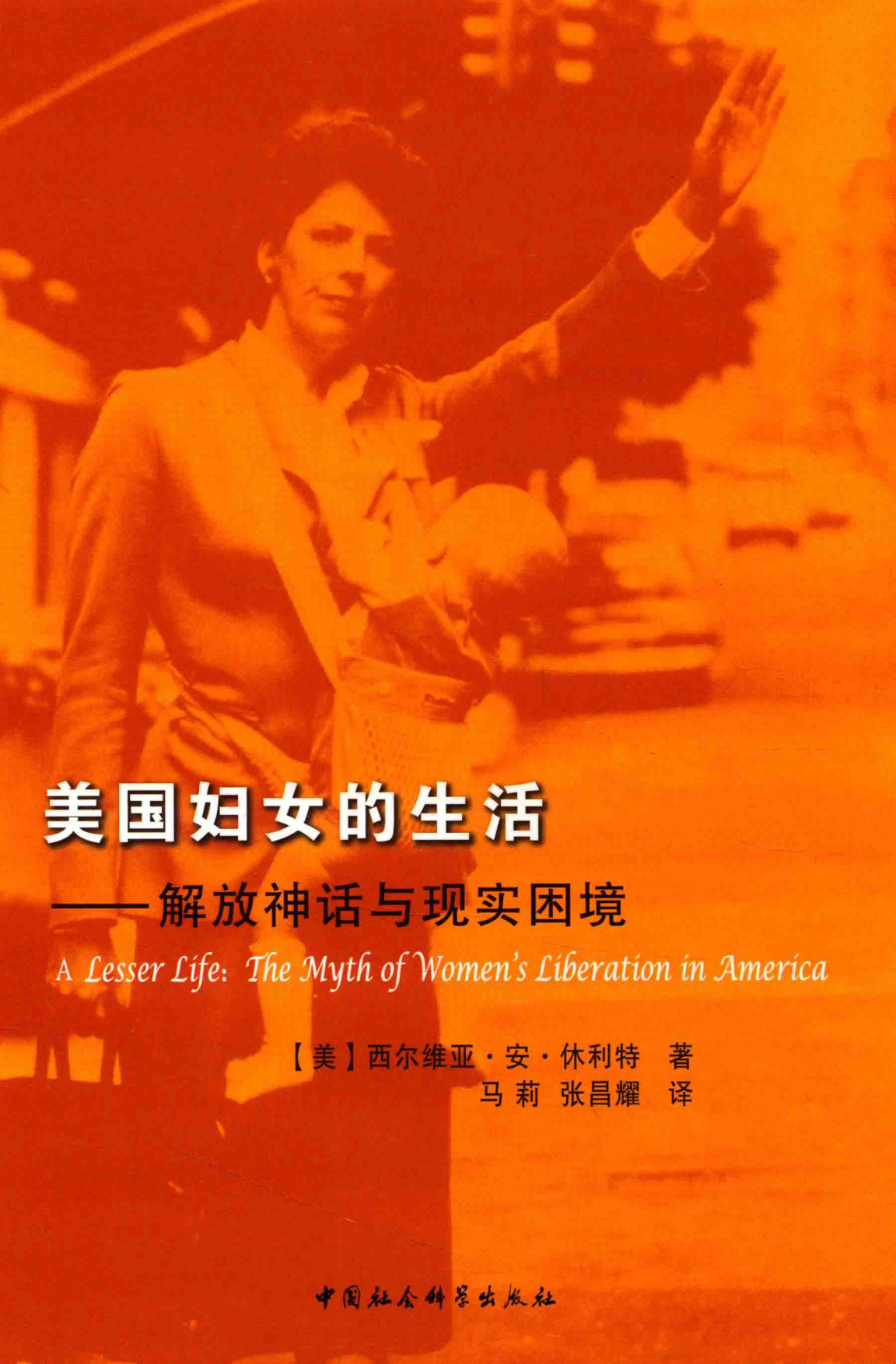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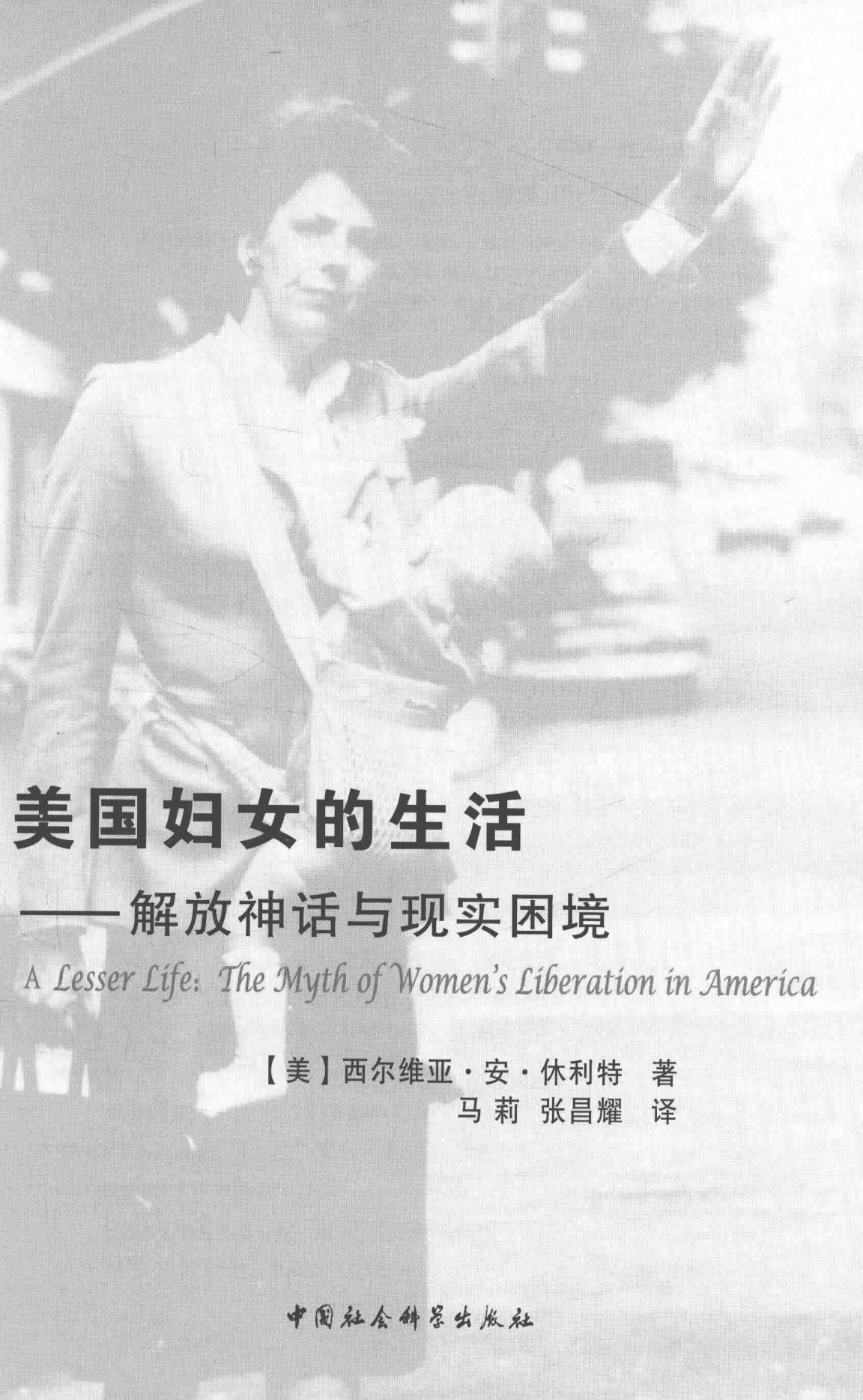
美国妇女的生活

——解放神话与现实困境

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美】西尔维亚·安·休利特 著
马莉 张昌耀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妇女的生活

——解放神话与现实困境

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美】西尔维亚·安·休利特 著
马莉 张昌耀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2016-947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妇女的生活：解放神话与现实困境 / (美) 西尔维亚·安·休利特著；马莉，张昌耀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1

书名原文：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ISBN 978-7-5161-9382-2

I. ①美… II. ①西…②马…③张… III. ①妇女问题—研究—美国
IV. ①D771.28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060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81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鸣 谢

这是一本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书。在这本书里，它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和职业碰撞的结合。因此，它给予我一种特别的快乐去感谢我得到的来自家人、朋友及同事的很多帮助。

我最应该感激的是我的丈夫 Richard Weinert。无论是从学术还是在家务上，没有他不懈的支持，就不会有今天这本书。他读了六次改稿，他是我严厉和最有建议性的评论家。最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三年里，在无数个晚上和周末，他不仅需要做饭，还要照顾孩子，我才得以工作。如果每个职业妇女有这样的一个伴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会是多余的。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孩子们——Shira、Lisa、David 和 Adam。我每天都感到他们对我的爱。我有时工作时间很长并且很辛苦，但他们个个都为有我这样一个母亲而骄傲。此外，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也都源于他们的出生和童年所遇到的问题。

我还要感谢许多人。我一直非常依赖我的编辑 Pat Golbitz，她对本书的郑重承诺，使我熬过一次次的改稿痛苦。我的代理 Molly Friedrich，不仅慷慨地付出了时间，还帮我判断及给予我友谊。没有多少作家能得到这样全心全意的支持，因此我非常感激。

我得到最大的文化知识帮助应归功于 Betty Friedan、Lenore Weitzman 和 Sheila Kamerman。书中的许多辩论都充满了她们的思想和她们的学术研究。我对她们的思想成果表示致敬。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一直受到“经济政策委员会”同事的鼓励。我想对他们表达我的谢意：Robert O. Anderson、Doug Fraser、Charles Barber、Ray

Marshall、Jack Sheinkman、Henry Kaufman、John Sweeny、Alice Ilchman、Albert Shanker、Ed Luck、Dan Burton 和 Rose Carcaterra。

我也要感谢 Elizabeth Jakab、Joyce Kozloff、Charles Perrow 和 Benjamin Kalman，感谢他们对本书初稿提出深思熟虑的意见；感谢 Margie Simmons，感谢她为本书付出的时间和非常专业的指导。Pam Laber、Judy Farrell、Marthe Abraham 和 Marie Sauveur 在整个我写这本书的工作中，自始至终提供了无价的帮助。还有 Wendy Atkin、Kathryn Bregman、Roy Brown、Frances Beinecke、Tru Helms、Abby Hirsch、Helen Knight、Ruth Spellman、Thelma Weinert 和 Marcia Welles 都给予我非常大的支持和关爱。我感谢以上所有的人。

我同样感谢所有我访谈过的人：包括商业领袖、记者、政府官员，以及上百名来自五个国家的在职父母们，感谢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从这个关键的意义上说，是他们使本书的写作得以顺利进行。感激之情，不尽言表。

最后，我衷心感谢我的父亲 Veron Hewlett 和母亲 Jean Hewlett。是他们教育我要做到事业和家庭两不误，而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认真思考过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父母之爱是我走向成功的不竭动力。

1985 年 9 月于纽约市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个人经历	(7)

第一部分 进退维谷

第三章 离婚的经济后果	(33)
第四章 工资差距	(48)
第五章 受伤害的儿童	(78)

第二部分 妇女运动

第六章 想象与现实	(101)
第七章 平等权利与社会利益	(109)
第八章 妇女解放与为人之母	(130)
第九章 《平等权利修正案》：一个判例	(145)

第三部分 一反常态的五十年代

第十章 居家生活至上	(173)
第十一章 母性崇拜的兴起	(191)



第四部分 反抗与应对

第十二章	挣脱五十年代的束缚	(217)
第十三章	男人造反	(233)
第十四章	当代两大妇女阵营的对立	(249)

第五部分 政治可能性

第十五章	工会能为妇女做什么?	(263)
第十六章	探索答案	(282)
第十七章	结语:后女权主义一代的声音	(294)
后记		(311)
Notes(注释)		(322)
译者后记		(366)

第一章 绪论

“我做得怎么样？”这是纽约市市长埃德·科奇常作为他竞选活动的一个挑战性口号。问一问有关美国的妇女问题，我们怎么样？答案可能又是老生常谈：孩子，我们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但是，我们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把该问题展开来说，美国妇女与欧洲妇女相比又如何？答案可能让人沾沾自喜：也许这里的事情并非尽善尽美，但是我们无疑比欧洲妇女领先好多年。

果真如此吗？我曾经认为是如此。我生长在英国，像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常常带着崇敬的心情看待美国妇女：她们毕竟是最强势和最解放的群体。

我的观点带有传统性。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被它的公民和外国人视为妇女生来就自由的国土。在美国，妇女享有其他国家妇女无法比拟的独立和自由。19世纪初期，关于美国妇女的优越地位，法国贵族和社会评论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指出：“我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妇女有那么高的地位。”这是托克维尔在1830年写下的话语。¹在近代，美国妇女比她们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妇女享有更多的公民权和教育。大概是为了证明这一点，美国的妇女运动比其他国家更有声势。美国女权运动的突起，是美国妇女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具体证明。

当我在1960年代末期作为一名研究生来到哈佛大学时，我感到了双重的幸运：我不仅来到了美国这个对移民来说总是充满机遇的国土，而且我感到我注定会享受到对妇女来说正处于黄金时期的年代。早在1970年代，妇女运动就已趋成熟，对妇女紧闭的大门忽然打开，争取女权运动正在清除那些阻



碍妇女取得事业成功的障碍。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成家，拥有孩子，对这一切我都充满自信。几年以后，当我真正去应付怀孕、哺育孩子并同时建立事业的时候，我懂得了大多数妇女在经历同样的困难时有多么的艰难。这比我所想象的新一代女强人既养孩子又要工作还要艰难得多。

当我生活在美国时，我与在英国的姐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的两个姐妹这时与我一样，既工作又抚养孩子。但是她们似乎没有像我这样艰难。起初，我以为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工作类型、不同的事业抱负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所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感到疑惑。

于是，我决定对此做点了解。我越了解，越感到震惊，并且变得沮丧。因为尽管这些新女性都是工商硕士、医学博士、宇航员、电视新闻广播员，现代美国妇女仍由于经济上的不稳定而饱受磨难。经济上还不如她们母亲那个时代稳定。即使现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妇女相比，她们的情形也相当糟糕。

现在让我们回头看 1950 年代。当时传统的劳动分工让妇女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保障。也许，许多妇女婚姻有些不幸，但是男人每天去上班，并且所赚得的钱能够维持家庭。妇女操持家务，并抚养孩子。但随着性革命和性解放，这一切全变了。离婚成了普遍现象，离婚率是以前的三倍，并且，妇女不能再指望她们的婚姻能给她们带来经济上的保障。

当然，这也是整个世界的趋势。但是，美国的离婚率比其他富裕国家要高出 2—20 倍。由于离婚，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妇女在经济上遭受的不稳定和创伤都要严重得多。²

随着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末期传统婚姻的崩溃，妇女就业比例急剧上升。这既可解释为部分原因，也可视为一定后果。传统角色的削弱迫使妇女加入劳动大军。与此同时，参加工作并挣到钱这一事实，使得更多妇女从她们以前的传统角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了。

这又是当前主流的一部分。从整个世界发达和先进国家来看，近几年妇女就业的比例都在急剧上升。她们在工作场所的报酬又如何呢？美国妇女所挣的工资大约是男人的 64%。并且这种工资差距，无论是对公司的高级职员或是对零售店的记账员来说，都是如此。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鲜为

人知的是，美国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工业国中工资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过去 20 年里，美国是男女工资差别一直没有缩小的仅有几个国家之一。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现代的美国妇女，无论解放与否，无论是作为妻子和母亲，或作为工作者，她们的经济都没有多大保障。她们被挤压在传统和现代这两种经济保障形式之间。这在其他社会里还不曾见到。

我们的母亲那一辈，她们大多数能够在其婚姻中找到经济上的保障。但是这种途径现在已不再适用了。由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男人无法成为家庭的依赖；至少，不能指望男人长期来养家。

逐步升高的离婚率是一个关键因素。由于离婚，男人通常放弃对妻子包括对孩子的抚养责任。这样，婚姻的破裂极大地增加了男女之间收入的差距。

在《离婚革命》一书中，斯坦福社会学家利罗·威茨曼指出：离婚后前夫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42%，而前妻（以及她的孩子）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 73%。³ 由于仅有 5%—10% 的离婚可以得到赡养费，并且 2/3 的母亲们从前夫那里根本得不到任何资助，这使得成千上万的妇女不得不完全承担抚养孩子的经济责任；⁴ 由于离婚所导致的经济收入下降，美国妇女和孩子占本国贫穷人口的 77%。⁵

但是，也许现代妇女既不需要也不想要传统婚姻所带来的安全感。毕竟人们已习以为常地认为，今日所解放的妇女应该能够在劳动市场上找到她们的经济出路；然而，在工作场所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存在。美国女性所挣工资只有男性工资的 64%，⁶ 尽管她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与这些男人相同。这不像其他国家的妇女，在教育方面不如男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男女之间这种工资差距仍没有缩小，并且将来也没有缩小的迹象。一个女人的工资，通常是不能够养活她自己的，更不用说一个家庭了。得到一份工作并不能使一个离异的母亲脱贫。

与此相反，在西欧，妇女的经济自立情形比较好，那里仍保留着比美国更为可靠的婚姻，因此，传统的经济保障形式就有更多的意义。美国现在的离婚率是瑞典、英国以及德国的 2 倍；是法国的 3 倍；是意大利的 20 倍。⁷ 在工作方面，欧洲的工资差距一直在缩小，并且欧洲妇女的工资现在比美国妇女工资高出 2%—30%。⁸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这些美国以外的先进民主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对家庭进行支持的制度，诸如带薪产假、儿童补助费、日托津贴、免费保健医疗等，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上班的父母亲莫大的安慰。⁹与此相反，美国60%多的在职母亲无权享有产假，而且，近来社会福利的减少更进一步降低了孩子受公共照顾的水平。¹⁰由于90%的妇女在她们的生活中都有孩子，因此，养育孩子的问题就显得十分尖锐。¹¹

换句话说，与其他国家的妇女因男女收入差距缩小、家庭支持体系得到加强而使婚姻有保障、物质生活条件得到逐步改善的情况相比，美国妇女却越来越容易受到伤害。尽管美国妇女一直在追求权利和特权，但她们实际上面临着经济上日益下降的现实。

《华尔街日报》非常透彻地阐述了这一问题。此报用下列词句描述了我们这一代美国妇女：“1970年代早期的年轻妇女，赋有才能和自信，顺利地毕业于各个大专院校。拥有着所取得的法律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开始向那事业的阶梯攀登。¹²她们唯一遇到的障碍就是：这些妇女发现她们的事业在她们做母亲时被毁掉了。”¹³尽管这些妇女很快乐地成为母亲，但是，当她们看到她们因养儿育女而事业荒废时，她们总是感到难受。无疑，《华尔街日报》击中了要害。

这个问题还集中在社会角色的冲突上。人们期待我们这些在1970年代已经成熟的妇女不但在业余时间抚养孩子，而且同时在劳动市场上与男性竞争。这种双重负担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根据对做母亲肆意夸张的观念，人们期待我们去养育这些孩子。实质上，我属于那一代“幸运的”女强人。我能够把1950年代的养育标准与1970年代声势浩大的女权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但是，当我们中间许多人发现在我们奋力生养孩子的同时还要兼顾事业的时候，1950年代那些“母亲崇拜”的僵化标准已不可能与我们在激烈竞争中所要达到的同样严格的标准结合起来。只是有些像我一样的人，最终徘徊于世俗的母亲与执着追求终生事业之间。由于这些要求是无法满足的，并且也是矛盾的，我们最终无法满足这两项要求中的任何一项。无论是雇来的用人还是具有维持家庭能力的丈夫，都不能使身在工作中的母亲从这些对抗性的压力中摆脱出来。

我自己的困境促使我提出了本书的核心问题：世界上最有独立性和受过最好教育的妇女，她们的生活状况却是最不好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再者，美国妇女运动为什么没有阐述这些关键的经济问题？为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决定对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瑞典这四个西方民主国家做些调查。这些国家都为大多数女性公民提供了较好的生活条件。我深入地对这些国家进行了逐一的研究。我不仅与普通的老百姓交谈，并且也与学者们以及内阁大臣进行对话。我一心想弄懂这些国家对待妇女问题为什么比美国做得好。我之所以选择这几个国家，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某些政治观念；我不仅选择传统的天主教社会进行研究，也选择世俗的福利国家进行研究。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以上所涉及的国家都属于西方富裕的民主国家，能够与美国相互比较和对照。

我选择这些国家，还有一点，是因为我比较了解它们。我在英国长大，曾在法国和意大利生活和工作。再者，我在瑞典做过研究工作。这些亲身经历使我能论述并解释我所收集的大量资料。

同样，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想拓展一些有利于改善美国状况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于是，我决定直接求助于美国经济中的一些主要决策人。自 1981 年以来，我一直担任经济政策理事会（EPO）的主任。该理事会是由商业巨头、劳工团体领导、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以及政策分析家等所组成的一个强大的私立“智囊团”。该理事会每年成立两个研究问题的专门小组，每一个专门小组探索一个主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归纳出可采取的政策来。我使经济政策理事会相信美国的家庭生活正处于革命变化之中，并且正在摆脱主要受经济和社会牵连的一些问题。1983 年，我们成立了一个研究政策的专门小组。该小组是由艾利斯·赫奇曼（萨拉·劳伦斯学院院长）和约翰·斯威尼（国际雇员服务联合会主席）领导，并由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成立的。它的使命就是调查本国在职父母所面临的问题，然后提出一些政策措施，以便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专门小组的其他成员是：美国前任总统吉拉德·福特，华纳通讯公司总裁斯蒂文·罗斯以及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

我认为，这些活动会带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而不是虚设，或只是虚



幻的承诺。专门小组的成员，对所面临的问题抱有同情心。他们不是一些专职的社会改革家，而是一些握有经济大权和政治大权的精明实干的人。此外，由于会员中大部分是男士，他们就不可能对妇女问题那么关切和敏感。我想一探究竟：当今的美国能为妇女做些什么，而不是设想一些乌托邦的东西。

第二章 个人经历

等到我有孩子的时候，我对自己充满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好爱和工作；即使现代妇女运动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并没有对其有很高的指望。在 1970 年代初期，妇女在事业成就方面已经迅速地打破了男人的垄断。此时的我，像成千上万站在我面前受过教育的男人一样，别人的说服使我相信我能够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并且能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当与我同时代的政治活动家告诉我美国妇女从未像今天过得这样好时，我对他们所说的深信不疑。当他们告诉我，我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时，我也毫不怀疑。

现在很难记起在那些岁月里，我的前程和未来有多么光辉灿烂。由于我早年完全生活在沉闷和无望之中，因此，那时我对前程是一片茫然。我们家位于英国南威尔士一个狭窄并且失业者众多的矿区里，我有五个姐妹。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父亲是一位勤奋工作的教师（没有儿子），对他的六个孩子充满信心。尽管我们是在贫困的境地中长大——没有冰箱、电话、电视、汽车，但父亲经常鼓励我们要有远大理想，尽力使自己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大多数孩子都下定决心按照父亲所说的那样去做。但这是一种充满很多艰辛和寂寞的奋斗过程。我的童年和成年面临的都是严峻的现实。在我 7 岁时，我所掌握的最有用的技能就是能够飞快地削土豆。由于我们每天晚餐都是吃土豆，因此我有很多练习的机会。在 14 岁时，我成为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因为无论是我的衣橱（我们姐妹几个从未有过新衣服，我们穿的都是别的家庭不要的衣服），还是我的事业抱负，都很难使我进入当地的工人阶级队伍。但是勤奋工作和执着精神使我得到补偿。在我 17 岁时，我被剑桥大学录取，并且在这所高等院校里开始了我成功的学习生涯。

1976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我跨过大西洋来到了这个对我、同样对许多其他移民来说，永远是一块“希望之地”的国家。我并不失望。这个大社会正处于百废待兴之中。美国正在努力消灭贫穷和城市衰败。年轻的一代正在摒弃中层阶级那一套物质生活，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这种不道德行为而感到极为愤怒。黑人和妇女，正向世人宣告他们的出生权和平等权。我至今仍能记起当时的振奋场面。我感到我来对了地方，我来的也正是时候。20世纪后期的美国，妇女将会得到所有社会进步和变迁带来的益处，我感到我注定是她们中的一分子。虽然我并不十分相信这世界就在我的脚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阻挡妇女取得事业成就的障碍正在清除。我们被允许加入社会的主流，在平等的条件下与男人在权力、地位以及物质奖赏方面进行竞争。至少，我认为，我不会再去重复我母亲的生活，眼看着我最好的年华在那种无尽枯燥的家务中逝去。

在1970年代初，我返回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完成我的博士学位。但是，在1974年，我决定把我的家安在美国，并且接受我的第一个专业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经济系副教授。两年以后，我结婚了。1977年，当我31岁时，我有了第一个孩子——莉萨。女儿美丽又健康，我感到无比幸福。然而，在抚育她最初的几个月里，我是相当艰难的，充满了苦恼和失败。起先，我试图用母乳喂养。但是，我在巴纳德（一所极有声望的女子院校）教书，该校没有为妇女提供产假（带薪或不带薪），生完孩子10天后，我就返回学校工作了。尽管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仍无法把教学工作与喂奶工作结合起来。最后，我没有奶了，我极不情愿地用奶瓶代替了母乳喂养。我感到我没有充分地与孩子配合好，我似乎没有通过做母亲的第一次考试。

更严峻的挑战接踵而来。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母亲，我读了有关哺育孩子的指南手册，我惊愕地发现，专家们的建议大部分与我所处的工作实际状况格格不入。大部分仅是简单地论述母亲一天该有16个小时与孩子在一起。除了生理上照料以外，还应该有一些综合的义务，譬如，应该是“孩子世界和每日经历中的建筑师或设计师”，“一位能对孩子不断提供建议和帮助的顾问”。¹只有完成这些角色时，一位母亲才能算得上是让她的孩子有一个良好



第二章 个人经历

的开端。我从未发现，有哪本书超过两页来论述一个在职母亲如何抚养孩子。大多数专家或多或少都对母亲在职怀有敌意。本杰明·斯波克说，除非一个母亲绝对需要工作，否则，对于“花钱让其他人来带孩子，做这些可怜的家务工作”，就是不可理解的。²与此同时，布瑞·布雷泽尔顿争论道：“两个母亲不如一个母亲好”，³并敦促母亲延迟返回工作的时间。我感到布雷泽尔顿应该去跟我的老板说一声才是。伯顿·怀特相对宽容一点，作了一点让步，他认为如果一位母亲把“她的工作时间安排在她孩子午睡”的时候，⁴那么这样的工作是允许的。但是，莉萨有一个与其他婴儿一样的习惯，午睡很短暂并且是无规律的。怀特先生是致力于学术的专业人员，他显然没有尝到过女人每天有不可预见的三小时不得不使其工作计划遭到破坏的滋味，因为他有妻子待在家里照看他的四个孩子。

我发觉，我与孩子养育专家的初次冲突使我备感受伤，但我仍决心做一个合格的好母亲。我是否能在其他比较困难的领域取得成功？我并不是每一分钟都待在办公室里或课堂上，我很认真地照顾我的孩子。清晨、中午和晚上时间都安排得很满，以尽母亲的职责。与此同时，我对我的工作一丝不苟，工作很晚，常常把工作带回家，并且经常还做些额外工作。我最大的恐惧是，一旦赋予我母亲角色，我担心不再被人看作是一位专心搞学术的人。

当莉萨3个月时，我每天的工作安排如下：5点起床，先喂莉萨，然后换尿布（她仍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好几个月后她才能睡通宵），从6点到8点，被视为宝贵时间，我试图集中这段“优质时间”给我那才3个月的孩子“打下智力的基础”。这种方式是伯顿·怀特在《生命最初三年》这本书中所提到的。⁵同样，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如鼓励莉萨去踢腿、发笑、咕咕地叫。我按照建议，把莉萨放在婴儿车椅上，然后推着车椅在房间里转，并拿着一些钢制镜子，在她面前（6英寸之远）做些复杂的动作。⁶再如，把烹饪用具当成简单的玩具，鼓励她“用自己的手玩这些玩具”；⁷教她如何用眼睛跟着铃铛来回摆动，以训练她的注意力。⁸这后一种方式，母亲一般不容易做好，因为如果铃铛“突然响起，或让它静止太久，婴儿的视觉注意力就会转移”。⁹可怜的莉萨，她的婴儿时期一定非常劳累；我肯定不会允许她仅仅躺在那儿当一个婴儿。



我的丈夫理查德，每天早上大约7点就开始忙碌，为我们每个人做早餐，并收拾屋子。早上8点，我们所请的保姆到达。9点之前，我到课堂教书。我总是把我所有的工作尽量放在早上和下午早些时候完成。经常是午餐时间回到家里，再把莉萨带到学院里，参加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的系里会议。这样，我的中餐经常是吃一块三明治就打发了。从下午3点30分至6点，又是我和莉萨待在一起的“优质时间”。从6点至8点，理查德带莉萨睡觉，而我这时就做晚餐和洗衣服。然后从8点到半夜，我才做我的研究工作。我不仅教学院里所指定的课程，而且还有一些其他工作职责。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向我的同事证明，我仍是一个地道的做学术的人，并值得被考虑给予终身教职。我把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放在深夜，这样可以腾出时间与莉萨待在一起。结果，我总是缺乏睡眠。另一个棘手的事情就是，我只让保姆在每天部分时间带孩子，而非全天。我这样做，一是节约钱；二是不愿被人指责我是一个把自己的孩子完全交给陌生人带的母亲。尽管有这种安排，我除了在午餐时间处理工作外，下午3点30分以后有时还会碰上一些事情，我不得不带上莉萨一起工作。当你在工作时，还不时地需要照料你身边的孩子，这是多么令人头痛的事情！如果有个孩子在房间里哭闹，那么，你连写封信，或与学生会面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不可能做成。如果莉萨在我开会期间哭闹或尿湿了，我的同事就会不高兴。对于没有做过父母的人来说，这些混乱的场面似乎近于滑稽，经历这些，对于她们来说，似乎是一场噩梦。我现在都不明白，为了做好母亲，又要兼顾事业，我当时是怎样经受住了这些给我体力和精神上所带来的持久压力。

当莉萨四岁半时，我作了让步。我请了一个住家保姆。我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对我自己或对理查德的考虑（尽管这个阶段，我俩都累得筋疲力尽），而是因为我的同事对于我边工作边带孩子充满敌意。而且，我知道了，我再不能把莉萨带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了。最后促使我做出这种决定是因为下面的一件事。那年春天，我发现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张纸条，是我隔壁办公室一位同事写的。上面写着：“亲爱的休利特教授，我想指出的是，巴纳德是一所学院，而不是托儿所。”我感到吃惊并深受伤害。我们不是提倡为我们的女学生提供角色样板吗？但是我也感到害怕。自那以后，除了每年的圣诞节，